

我刊總第102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中刊出了曾鏡濤和劉雅章兩位博士的文章，全面系統地介紹了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的最新研究成果，警示了全球暖化危機的真實存在。2007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和IPCC，以表彰他們在改善氣候變化問題上作出的貢獻。為此我們感到欣喜。

之所以欣喜，並非緣於我們能洞察諾貝爾和平獎的走向，而是因為全球暖化給全人類帶來的危害已經廣為人知。然而，在欣喜之餘，我們依然憂慮重重。IPCC的工作已經證明，全球暖化的事實在科學上不容置疑。但是，應對這一危機，單靠自然科學是不夠的。當「節能減排」已經開始成為時尚的口號之際，人類是否能真正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以阻止全球暖化，還要取決於各種政治經濟利益的糾葛。對此，社會科學家們的把脈和處方便顯得非常必要。

——編者

革「憲政」命的俄國革命

金雁在〈俄國有過「十月革命」嗎？〉(《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一文中，還原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真實面貌。當年的俄國革命原來是以「憲政」之名進行的革命。從這個意義上講，俄國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列寧的政治謀略，而不是所謂的政治理想。

「革命憲政」最後失敗的標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誌是1918年的「一月劇變」。究其原因，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法國大革命的遺產已經昭示世人，革命與憲政原本就是水火不相容，革命壓倒憲政是一種歷史必然。試想一下，布爾什維克即使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中獲勝，也只不過是暫時披上一件有用的「憲政外衣」，在以後的正式議會選舉中只要出現一次失敗，它仍然會毫不留情地摧毀憲政制度，恢復革命合法性的本來面目。

俄國革命的歷史再一次提醒我們，選擇改革，就不可能不選擇憲政。那種以反對「西化」為名，實際上是反對民主憲政的所謂國家主義，是極其短視的。只要改革的進程還在繼續，作為民主派仍然必須堅守拒絕革命的底線，否則革命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憲政理想的破滅與民主派的消亡一樣是不可避免的。

嚴泉 上海
2007.10.29

能否站在普遍人權觀的立場抵抗工具理性？

7月份筆者有幸在南潯聆聽金觀濤先生的演講，此次又得以拜讀演講稿〈現代性及其

面臨的挑戰——當代社會價值基礎和問題的思考〉(《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晴有多雲」的第二次全球化圖景讓人印象深刻。金觀濤指出第二次全球化的兩朵烏雲，一朵是生態問題，另一朵表現為伊斯蘭教對西方的抵抗，他認為第一朵烏雲是消費社會造成的，第二朵烏雲的出現是因為工具理性發生了問題。在我看來，前者同樣跟工具理性有關，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認為科學無所不能的科學主義，而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是密不可分的。

金觀濤指出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用「文明衝突」解釋第二朵烏雲是有問題的，稱之為恐怖主義更是錯誤，他認為這是「伊斯蘭教對工具理性的抵抗」。同時，他還表示：「第二次全球化開始不久，特別是科索沃戰爭以後，政治哲學基本上確立了人權必須高於主權的大原則。在某種意義上講，這不能不說是現代價值的一個大進步。」

當我們說人權大於主權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承認人權的普世價值，無所謂「中國特色的人權」、「伊斯蘭特色的人權」或者「西方特色的人權」。那麼，伊斯蘭教對西方的抵

抗，是建立在承認這一普世價值的前提下，還是否認這一前提呢？伊斯蘭教的人權和西方的人權，究竟有多少共通之處，又有多少無法通約之處？伊斯蘭教對普遍人權觀的拒絕和對工具理性的抵抗，幾乎是同步的。這僅僅是巧合，還是一種必然？普遍人權觀和工具理性是甚麼關係？能否站在普遍人權觀的立場上抵抗工具理性？這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王曉漁 上海
2007.10.31

左翼電影的生與死

假如把二十世紀30年代想像為左翼文化與反動文化激烈交鋒、彼此不容的場景的話，那麼左翼電影自然必不可少，其政治功能則愈發凸顯；在此後的追溯中，左翼電影也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最終與左聯一起構成了30年代左翼文化戰線的堅實組成部分。

可是，左聯與其名義上的導師魯迅一直關係緊張；其主要領導者周揚、丁玲、胡風等人之間的矛盾更在數十年後引發了席捲整個中國文壇的風波，這樁公案直到今天仍然疑竇叢生。左聯尚且交織如此之多的恩怨，如何讓我們相信更鬆散的左翼電影就是鐵板一塊？

將30年代的中國電影簡單化約為左翼電影與「反動電影」的鬥爭，未免忽略了30年代中國在多種權力和意識形態交織互動下的複雜，更忽略了人性的複雜。因此，蕭知緯〈三十年代「左翼電影」的神話〉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的研究，對於重新解讀左翼電影背後的政治性具有示範意

義。隨着對左翼電影背後的權力格局了解的深入，才能更好地解讀左翼電影的生與死。

田應淵 昆明
2007.10.15

艱難的民主之路

秦暉〈孟什維克：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失敗〉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孟什維克走的是一條艱難的民主之路。成王敗寇，坐上權勢寶座者對於歷史的書寫有所粉飾，然而真正的學術研究，應該實事求是，應該通過對於歷史史實的研究，還原歷史的本真。

秦文梳理和分析了強調政治自由的孟什維克與注重人民專制的布爾什維克的對立，由於孟什維克「理論上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善權變，行為上堅持道德自律而不願使出辣手，對他人過份天真而不諳世事險惡，對自己『潔癖』太甚而處處循規蹈矩。……最終被自己過去的黨內『同志』消滅了。」這些分析都基於其對於歷史的細緻分析。孟什維克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列寧的「專政」看成內戰中的非常狀態，期待在戰後能夠恢復民主，但是內戰一結束他們就遭到了嚴厲的鎮壓。

秦文使我們看到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失敗的歷史，也看到了追求民主之路的艱難與坎坷，同時也看到了教條主義式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尷尬，必須與時俱進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尋找到一條民主之路。

楊劍龍 上海
2007.10.24

黨內鬥爭與反右運動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是一場整肅知識份子的運動，也是一場黨內清洗運動。林蘊暉先生的〈高幹右派：反右中的黨內「戰場」〉一文（《二十一世紀》2007年8月號），描述了反右運動中清洗「高幹右派」的黨內鬥爭，揭示了人們以往甚少關注的反右運動的另一面相。

反右運動中的黨內清洗對象，相當一部分是黨內具有民主意識的領導幹部，且這些黨內民主派多來自國統區城市的中共地下黨系統，其中最著名者莫如顧準。再如反右重災區的浙江省，省長沙文漢因主張黨內民主、黨政分工而與省委書記江華生嫌隙。沙為中共上海地下黨出身，江則為毛澤東井崗山中央紅軍的嫡系，沙自然成了反右運動的犧牲品。沙文漢夫人陳修良（時任省委宣傳部代理部長）也被打成右派，陳1940年代曾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

浙江被清洗的「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右派集團」，四位省級「高幹右派」中除彭瑞林外，均為白區地下黨出身。中央機關最大的黨內右派、時任監察部常務副部長的王翰，亦因倡言黨內民主而罹禍。王翰早年由上海交大棄文革命，長期在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黨革命活動。

顧準和沙王的悲劇，不僅由於其民主言論，而且有中共黨內中央系與地下黨的派系背景。以往關於反右運動的研究，對源於城市地下黨系統的黨內民主派關注不夠。

高力克 杭州
2007.9.27